



以新视野打开抗战文学的丰富图景

□唐小林

写作者既关注彼时流动的、鲜活的现实经验及其难题，也在感知历史动向的过程中捕捉正在凝结的“新质”，并尝试用各自不同的方式为其赋形。尽管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和困境，但战争年代的作家们还是艰难地打开了一种朝向未来、指向我们当下的独属于抗战文学的书写视野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样的时刻重新思考如何阅读、研究抗战文学的问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事实上，战争年代的作家们也曾一直苦苦思考如何创作抗战文学。老舍当年就直言，“我们今天不写战争和战争的影响，便是闭着眼过日子”。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很多作家“不知道战术与军队的生活，不认识攻击和防守的方法与武器，不晓得运输与统制，而且大概也不易明白后方的一切准备与设施”。对于生活在战争年代的作家们而言，战争毫无疑问是最大的现实，他们的写作自然无法脱离这个大背景，但也存在大量老舍说的“不易明白”之处。因此，可以追问的是，对他们的写作而言，战争仅仅是一种背景性因素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我们如何认识战争在这些文学中的位置和呈现？在社会实践和文学书写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秘密通道？透过身处的战争，作家们究竟看到了怎样的生活？他们借助何种框架理解那些“不易明白”的与战争有关的问题，并最终以怎样的方式将之编织进文学的叙事当中？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还可以在怎样的视野下阅读抗战文学？

抗战文学的研究视野和问题脉络

既有的抗战文学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并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逐渐生成了多种不同取向的研究路径。其中有两种较有代表性：一是聚焦具体的战役，关注对抗战的直接书写，多涉及前线战场上的相关现实经验；二是讨论作家们在战争年代普遍获得的历史经验、情感结构和审美认知模式，这类研究将抗战文学放置于1940年代的总体战时语境中展开研究，主要讨论不同作家的战争体验及其表达。借用老舍“写战争和战争的影响”的话来说，这两种研究路径或许也可以简单概括为“抗战”视野和“抗战的影响”视野。虽然这两种路径针对的作品不尽相同，其侧重点也稍有差别，但都为抗战文学研究的推进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可以进一步展开讨论的是，如果不仅是一种背景性因素，那么战争如何具体重造着作家的主体并最终改变了文学的形态？这里涉及的战争话题，首先指的就是抗战，而不是国共内战或别的战争，因此抗战文学研究有较为确定的问题对象和时间边界。即使在“抗战的影响”研究视野中，我认为很多文学创作所涉及的“抗战”也可以得到更加具体的呈现，需要尽可能在研究中阐明不同战争事件、经验的差异性及其带来的各自影响。比如，在丘东平这里，抗战多指“淞沪抗战”，他要处理的是正面战场上的直接经验；对萧红而言，她的抗战文学始终回应着“九·一八事变”，其写作意识与东北流亡作家的普遍性创伤体验有关；而茅盾在抗战时期的文学实践与创作调整，则与“皖南事变”、政治挫折密切相关……所谓“抗战的影响”虽然有其普遍性的面向，但总的来说，这种“影响”并不是抽象的、笼统的，而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最终给他们带来的是一个个复杂的、需要分别直面的问题情境，内地塑造了他们各自的感知方式和观念结构。对战争年代的作家们而言，这些具体的战争经验对他们的写作产生着更直接、深刻的影响，这或许也是当下抗战文学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阐发的地方。

在当时，很多现代作家没有直接投入前线战场、参加实际战斗，因此他们的写作更多是在“抗战的影响”下展开的。即使强调“抗战的影响”，也不意味着他们区隔于抗战，而是表明他们无时无刻生活在抗战的空气当中。正如

萧红认为“躲警报”也是一种战时生活，但是要求作家有“抓到”的能力，否则便无法真正“打进”紧张的战时生活中。如果我们承认战争可以大致分为军事面向和非军事面向，那么抗战文学的内容就不仅仅是抗战前线的战斗，还包括社会语境的变迁、人口的迁徙流动、个体的生命体验和记忆等，这也正是老舍说的“战争和战争的影响”。因此，相关抗战文学研究既应关注丘东平这类直接书写前线战争的军人作家，也需要讨论沈从文这种曾经被视为“与抗战无关”一派的自由立场作家，重新考察战争年代的作家们如何捕捉战争经验的碎片，最终熔铸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理路。具体来说，可以将战争年代的文学实践落实为一系列具体的“问题脉络”，如战时生活的形式、组织动员的方式、战争局势的走向、迁徙流动的影响、个体成长的难题、政治挫折的体验、情感结构与观念结构的再造等。正是在回应这些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战争年代的作家们贡献出了广阔而幽深的抗战文学图景。

“抗战”作为一种方法

受惠于近些年来“1940年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作为其主体部分的抗战文学研究在问题视野和方法路径上都有新的发展。不过，很多研究其实依然是在“抗战的影响”视野下讨论抗战文学，强调战争对作家主体和写作方式产生的多重影响。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除了带来不同维度的生活经验、感知结构和叙事模式外，“抗战”还有可能作为一种方法吗？有时候“后退一步”，退到战争发生的历史时刻和问题情境中，或许能够“抓到”萧红说的“战时生活”，从而真正理解抗战文学曾经抵达过的现实深处，并重新打开那段历史的丰富褶皱。

对战争年代的作家们而言，如何书写抗战一直是个难题。因此，当年“七月派”作家会特别关注抗战以后“新形式的产生”“作家与生活问题”和“作家态度”等话题，这些讨论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问题来看，首先是“写什么”，其次是“如何写”。或者说，前者关乎作为具体“内容”的战争，后者则涉及作家们通过某种“形式”来抵达战争经验的问题。正如钱理群所言，即使是那些曾经处于“时代边缘”或被视为“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其实也暗含着对“战争”的某种体验，只是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立足点。这个所谓“立足点”，与作家如何进入现实、理解世界有关，其实就是作家们借助的各种各样的“形式”。

将“抗战”作为方法，意味着要重新发掘和考察具体的战争在文本中的结构性作用，并思考这些不同的战争经验如何生成了独特的文学形式。对战争年代的作家们而言，“抗战”不仅是一种生存境遇或书写对象，也可能成为他们重新接通生活、再次打开一些难题的媒介。从这个角度展开对抗战文学的考察，会发现很多原先不在抗战文学视野中的作家开始浮现出来。抗战不仅激发了他们的写作，而且沉淀为一种有意味的文学要素，进而催生出新的叙事模式，为我们的重读提供了别样的线索。

正是在社会实践和文学书写之间，大量的文学形式被生产出来，它们既与战争经验形成同构性关系，也保留了自身独特的审美意识形态。这些形式并非完全透明，而是标示出一种无法抹除的差别，有待于我们在细微的文学表达中将之识别出来。

作为“明日的艺术”的抗战文学

在讨论抗战文学时，还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即这些作品虽然写的是战争年代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但其中贯穿着作家自我成长和重造文学方式的努力。抗战带来现实世界的剧烈变动，如果想要真正深入理解这一新的现实，作家们必须不断打碎、重组自己的认知结构，从而创造出更新的主体内核和文学方式。这些文学经验最终催生了丰富的形式实践，因此得以逸出一时一地的限制，而不断向未来敞开。或许可以借用沈从文的说法，将战争年代的文学经验与形式实践视为一种“明日的艺术”。这种“明日的艺术”，企图在人与人间建设一种新的关系。这种“新”，既与人的主体、社会现实和文学方式的重造有关，也指向了一种有关未来的构想，其中蕴含着丰沛的历史能量和广阔的研究空间。

“明日”及其相关话语生产是既有抗战文学研究较少关注的问题，但却贯穿着战争年代作家们的写作脉络，是他们的重要关切之一。比如，丁玲在她笔下人物贞姑身上发现了“新的东西”、丘东平塑造出“旧队伍”中的“新军人”、沈从文念兹在兹的“更新时代的牧歌”，萧红没来得及给马伯乐提出的“光明的交代”，以及胡风从路翎小说中看到的“美学上的新课题”等，都是“明日的艺术”的直接投影。可以说，抗战文学不仅对沉重的现实进行叙述，还将触手伸向了历史进程的前端，尝试勘探“未来的”内在肌理，最终指向的是对新的主体、社会和民族的重建的期待。

不过，战争年代的作家们对“明日”的想象，往往关联着一系列“难题”。例如，如何在抗战语境下完成自我改造并获得成长？怎样将个体的经验与抗战的进展、国家的重建结合在一起？有关远景的叙述如何落实到具体社会实践当中？是否可建立一种完整有效的文学形式方案？这既是抗战时期的一些共性问题，在不同政治空间、地方视域下又展现了各自的现实症结。比如在解放区，远景与革命政治实践密切相关，通常被放置于现实生活同步展开；而在其他区域，战争的局势更直接地影响了作家们对远景的叙述，特别是随着战争带来的破坏，有关未来的想象往往变得不稳定起来。与此相关的是，萧红的《马伯乐》、沈从文的《十城记》、茅盾的《第一阶段的故事》等很多抗战时期的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呈现出一种“未完成性”。这已经成为抗战文学的一种症候，也说明作家们的文学经验及其形式实践依然处于一种敞开的状态中。

这正是“明日的艺术”的特质，其写作者既关注彼时流动的、鲜活的现实经验及其难题，也在感知历史动向的过程中捕捉正在凝结的“新质”，并尝试用各自不同的方式为其赋形。尽管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和困境，但战争年代的作家们还是艰难地打开了一种朝向未来、指向我们当下的独属于抗战文学的书写视野。今天，我们依然处于世界变局和战争阴影之下，面临着诸多相似的议题和困境，而这些抗战文学在穿过厚重而漫长的岁月后，终于抵达了战争年代的作家们曾经想象过的“明日”。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抗战文学是一种可以被重新汲取的可贵资源，它们不仅见证了社会历史的变迁，为我们此时的思考提供了种种参照，也最终成为了照亮我们自身现实处境的一束光。正如有学者所说，那一辈的作家，似乎是我们这些今天的读者写作的源头。或许，这也是我们当下阅读抗战文学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上海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

■声 音

浙江绍兴鲁迅纪念馆的“抽烟墙”是游客热门打卡点，墙上的鲁迅夹着香烟、眼神犀利，背景则是简洁的黑白线条，颇具文艺感。不少游客会点烟或打开打火机，拍摄“给先生点烟”的照片，以此致敬这位文学大师、思想大师。近日，有控烟志愿者提出，这幅墙画改编自鲁迅在书房抽烟的照片，去掉背景后容易让人误认鲁迅在室外吸烟，存在“诱导吸烟”“误导青少年”的风险。因此，建议将鲁迅的夹烟动作改为“右手握拳”。

毫无疑问，这位控烟志愿者的出发点是好的。这份对公共健康与未成年人成长的关注，体现了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但是，她提出将鲁迅标志性的抽烟动作改为“右手握拳”，实则陷入了对历史场景的过度干预，也偏离了纪念馆展示人物形象的核心意义。

首先，这幅墙画的核心是还原鲁迅生活中一个广为人知的真实细节——抽烟是他长期伴随创作与思考的习惯。从现存的历史照片中，能清晰看到他伏案写作时指尖夹烟的场景。不少与他有过交往的文人也曾回忆，鲁迅常以烟提神、辅助构思。这一行为并非刻意为之的“负面符号”，而是构成他“不只是思想家，也是有生活温度的普通人”这一立体形象的重要部分。就像普通人在思考时喝茶、散步一样，鲁迅的“抽烟”是附着于人物形象的生活印记，其目的是让历史人物更鲜活可感，绝非传递“吸烟有害”的暗示，更谈不上“诱导吸烟”。

至于“去掉背景易误导室外吸烟”的顾虑，其实忽略了两个关键前提。一方面，墙画的设计简化背景，大概率是出于视觉聚焦的考量——用黑白线条突出鲁迅“眼神犀利”的核心气质，避免繁杂背景分散观众对人物精神面貌的关注。这是公共文化空间常见的艺术处理手法，并非刻意模糊场景。另一方面，将单一画面直接等同于“误导”，未免高估了其对青少年的影响。当下青少年对“吸烟有害健康”的认知，更多源于家庭日常的引导、学校系统的健康教育，以及公共场合随处可见的控烟标识。而对历史人物画像的观看，更多的是出于了解历史人物面貌的需求，而非对“他做的每个动作都要模仿”的盲从——很难想象，一个接受过基础控烟教育的孩子，会因看到鲁迅的画像而忽视“吸烟有害”的常识。

其次，纪念历史人物的核心前提是，尊重其历经时光沉淀的真实面貌——这种“真实”不仅包括他的思想成就，也涵盖那些不违背公序良俗、构成其个人特质的生活细节。鲁迅之所以能成为跨越时代的精神符号，关键在于他以犀利的文笔解剖社会、以深刻的思考唤醒民众，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剥离他作为“普通人”的生活印记。他爱穿长衫、喜吃油炸物，也常以香烟为伴辅助思考，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有血有肉的鲁迅”，而非一个悬浮于历史的“完美偶像”。若为了契合“控烟”的现实诉求，刻意将他标志性的持烟动作改为“右手握拳”，看似规避了争议，实则是对历史场景的人为篡改。

更重要的是，这种修改会削弱纪念馆“还原真实鲁迅”的核心教育意义。绍兴鲁迅纪念馆的价值，从来不是塑造一个“无瑕疵的精神符号”，而是通过书房场景、生活物件、人物画像等细节，让参观者走近鲁迅的真实人生，理解他的思想如何从日常观察与深度思考中诞生。若将其强行修改，反而让人物形象变得刻意、空洞，失去了打动人心的“真实温度”。毕竟，人们之所以尊敬鲁迅，是因为他能在平凡生活中始终保持对时代的清醒认知。

至于游客“给先生点烟”的打卡行为，确实存在不妥：一方面，在公共文化场所模仿吸烟动作可能传递不当信号；另一方面，将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娱乐化，也略显轻佻。但这种问题的解决方式，应是“引导规范”而非“修改形象”——纪念馆完全可以在墙画旁增设提示牌，标注“吸烟有害健康”等文字，甚至通过二维码链接鲁迅关于“控烟”的言论。这样既尊重历史，也履行控烟倡导责任。同时，通过工作人员引导、线上宣传等方式，提醒游客以严肃、尊重的态度纪念历史人物。

最后，公共场景的优化，尤其是鲁迅纪念馆这类承载历史记忆与文化价值的公共文化空间，从来不是“满足单一需求”的简单操作，而是需要在多重价值间找到平衡——既要坚守控烟倡导的公共健康责任，守护青少年免受不良引导，也要尊重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守住文化传播“还原真实、传递深度”的本质，更要顾及公众对历史人物“立体认知”的需求。

说到底，公共场景的优化不该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应是“兼容并蓄”的智慧——让控烟倡导与历史尊重并行，让文化传播与公共责任共生，才能让这些承载记忆的空间，既经得起现实的考量，也配得上历史的厚度。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

□巴山子

鲁迅抽烟墙该不该改？

金理认为，《凤凰籽》是一次“走出舒适圈的写作”，主人公的际遇浮沉与社会议题紧密嵌套，实现了传奇性与现实性的兼容。小说用“回溯”手法讲述故事，因而生长出两个“我”，一个是带着逃离的渴望、从小地方到大城市的“旧我”，另一个是成年后不断回望逃离过桯、思考怎样的人生更值得一过的“新我”，这让小说的成长叙事变得更具思想深度。东来谈到，自己和小说主人公一样，一路从乡村走向县城，再到大城市，“每隔几年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跳跃”。在不断接受新的生活和身份的过程中，有很多值得反思的时刻。创作这部小说，也是想要打捞这样的时刻，重新思考人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罗建森）

八方文讯

随笔集《放宽心，吃茶去》首发

近日，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莫言与友人王振联袂创作的随笔集《放宽心，吃茶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并以直播形式首发。直播中，莫言、王振与主持人杨澜畅谈创作点滴，分享来自生活的真感悟。

《放宽心，吃茶去》全书共五章，以散文、诗歌和摄影作品的形式记录了对人间事的灵感妙悟，也定格了作家眼中山川湖海、市井烟火的美好瞬间。莫言介绍说，书名源自自己因柏林禅寺未开、只能在门外遥观时创作的诗句“放宽心境吃茶去，大义微言梦里寻”。大家在对谈中谈到，“放宽心”的本质是接纳世界的不确定性，与生活和解，让过程本身成为滋养生命的力量。只有关注日常生活小事并有所体悟，笔下有景、有人、有情，才能以“往四面八方去，向自由自在”的姿态，呈现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

“大山里的小诗人”诗歌征集(第二季)启动

8月18日，由《诗刊》社和中国银联主办的“大山里的小诗人”诗歌征集计划(第二季)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李少君、李云雷、邓凯、朱钢、敬文东、娜仁琪琪格、金石开等主办方代表、文学期刊负责人和诗人、评论家参会。

自2019年起，中国银联携手公益机构累计帮助超过7000名山区儿童接受诗歌教育。2025年，中国银联携手《诗刊》社共同发起“大山里的小诗人”诗歌征集计划(第二季)，联合举办“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全国青少年儿童诗歌征文大赛，面向所有怀揣诗歌梦想的青少年儿童征集诗歌和歌谣。与会者表示，诗歌不仅是一种“文本”，更应该是一种“行动”。在孩子们的心灵中种下一颗颗诗歌的种子，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的人生。

(黄尚恩)

《龙凤歌》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

8月9日，胡学文《龙凤歌》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李黎，评论家贺绍俊、杨庆祥与作者胡学文展开对话。

长篇小说《龙凤歌》今年3月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围绕朱灯、朱红这对性格迥异的龙凤胎兄妹展开，书写一个家庭两代人的人生际遇，反映了广大农民的选择、坚守与命运流转。大家谈到，《龙凤歌》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作者试图在小说中探讨“变”与“不变”的哲学命题，并在语言风格、叙事结构上向古典文学靠拢，以此重新激活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精神资源。胡学文说，这是一部“为情而作”的作品，其创作源于自己长期萦绕于心的情感冲动。(王泓博)

探讨银发群体的生活智慧与生命价值

8月17日，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主办、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协办的樊希安新作《候鸟故事集》评介会在京举行。魏玉山、丁以绣、张亚丽、王霆钧等出版界专家和该书作者樊希安与会，共同探讨银发群体的生活智慧与生命价值。

短篇小说集《候鸟故事集》包含11篇中短篇小说。作者历时数年扎根澄江、陵水的候鸟聚集地，将目光投向北方寒潮中南迁海南的银发群体，以敏锐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展现出老年人丰富的情感世界与生命韧性。与会者认为，这是一部兼具生活气息和阅读趣味的佳作，作者在椰风海韵中追寻银发生活的意义，探讨退休不是终点，而是重新发现自我的起点。期待此作能唤起更多人对社会养老问题的关注，发现银发生活的无限可能。

(康春华)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举行首次欧洲巡演

8月15日，为期10天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2025欧洲巡演圆满收官。乐团携手指挥家郑明勋和钢琴家刘晓禹，先后到访英国爱丁堡和萨弗伦沃尔登、西班牙桑坦德、德国科布伦茨和汉堡等地以乐会友，在3个国家举行了5场音乐会和2场文化交流活动，与国际乐坛展开对话，受到欧洲观众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这也是该乐团

首次进行欧洲多国巡演。

今年是中国与欧盟建交50周年，也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成立15周年。带队巡演的国家大剧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赵海英表示，希望这次巡演以交响乐为纽带架起中欧文化交流的新桥梁，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的新图景。(王 兔)

《凤凰籽》聚焦成长叙事

8月17日，青年作家东来长篇小说《凤凰籽》新书分享会在上海举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与东来围绕作品展开交流。

金理认为，《凤凰籽》是一次“走出舒适圈的写作”，主人公的际遇浮沉与社会议题紧密嵌套，实现了传奇性与现实性的兼容。小说用“回溯”手法讲述故事，因而生长出两个“我”，一个是带着逃离的渴望、从小地方到大城市的“旧我”，另一个是成年后不断回望逃离过桯、思考怎样的人生更值得一过的“新我”，这让小说的成长叙事变得更具思想深度。东来谈到，自己和小说主人公一样，一路从乡村走向县城，再到大城市，“每隔几年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跳跃”。在不断接受新的生活和身份的过程中，有很多值得反思的时刻。创作这部小说，也是想要打捞这样的时刻，重新思考人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罗建森)

张曰凯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退休干部张曰凯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8月23日在京逝世，享年89岁。

张曰凯，笔名岂凡，中共党员。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悠悠玄庄》，小说集《祭歌》，散文集《觅踪寻痕》《故土怀古》，纪实文学《梦萦魂绕延安城》等。